

核不扩散话语的合法化

牟文富 郭贵民

摘要 核不扩散话语的产生是同核权力的产生联系在一起。这种话语的合法化过程是通过发话者数量的扩展、国际机制的建立和相应的立法、确立检查机制、成为知识和职业的对象等途径而完成的。核不扩散话语的合法化表明该话语不过是核权力在国际政治中的一种表现而已。

关键词 核不扩散话语 合法化 发话者 受话者

权力是一种“多重的力量关系”，是这些关系中“发生的分裂、不平衡的直接后果。”^①这是二战后核不扩散话语产生的内在原因。核权力的最大化时期在于很少或仅仅只有一个国家拥有核武器，或者，它存在于核国家和非核国家的巨大差距之间。按照现实主义政治的标准，权力的最大化是任何一个国家的目标，毫无疑问，核不扩散与国家的这种权力最大化目标是一致的。

核不扩散的话语关注着这样一些内容：对于核武器，有关国家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相关国家能够说什么和可以说什么。从核武器的诞生之际开始，其他国家的核活动便成为困扰世界上第一个核国家美国的问题，令其担心、焦虑，这一事实本身给双方带来了一系列的后果。压制、禁止和否定性的核不扩散话语在战后 50 年的时间里不断地被重复。其间，为数不多的该话语的发话者逐渐加入，使不扩散的声音逐渐扩大，在发话者权力所及的范围内，受话者不得不倾听。当 5 个常任理事国最后拥有足够的、作为其权力的坚实基础——核武器，并都加入发话者行列的时候，不扩散的话语便成了主旋律，占了压倒性的优势。当然，这种转变是在该类话语取得合法地位的过程中完成的。

核武器使国家拥有了无限的毁灭性的力量，是核时代国家权力的象征。核不扩散话语与权力组成了一种坚实的权力网络关系。非核国家在核权力 + 不扩散话语的关系网络中的地位和核行为/核政策总是受到制约，他们不得不表现出对核不扩散话语的认可和某种程度的忠诚。这就是核不扩散话语取得合法性地位过程的本质。

1. 否定关系的最终确定 美国决定制造原子弹，是一些卓越的科学家促成的，是经过罗斯福总统的深思熟虑而批准的。原子弹吸引人，因为从军事需要方面看，它带来的是巨大的毁灭性的能量。待到它实验成功了之后，给国家带来的是巨大的力量和权力。当美国拥有原子弹时，它当然意识到已经拥有了前所未有的权力。美国核活动是在高度保密的状况下完成的，既出于军事安全的需要，也出于效率。当它完成之后，它同权力前景结合在一起，出现了继续保密的惯性，产生了不扩散的话语。这是保密惯性 + 权力逻辑的结果。保密

的惯性还使美国在1946年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观点,“美国现在占领先地位,只要把技术知识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美国就可以继续保持领先地位。”^②

1946年出台的美国巴鲁克计划提议建立一个国际性的原子能发展管理机构,它将垄断一切世界上“危险的”可裂变物质及其生产工厂。不许任何国家生产原子弹,违者将受到制裁。这是初次出现的否定性语言,暗示核武器国家的欲望及行为将被列为否定的对象。1957年正式诞生的国际原子能机构着眼于确保核资源不被非核国家用于制造原子弹,并确定了检查机制,这样,否定性关系在制度上得以实现。1963年的部分核禁试条约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对签署国有约束力。1968年美国、苏联和英国达成开放性的、供签署的《核不扩散武器条约》将世界分为核武器国家和非核武器国家,前者不以任何手段使后者成为核国家,后者也承担义务不以任何手段拥有核武器。当然,核不扩散机制同样也借助于监督与检查手段来实现自己。

到1995年,公开声称自己拥有核武器的美国、俄罗斯、法国、英国和中国5个国家同意不扩散条约无限期地延长;1996年《全面核禁试条约》出台。至此,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成为永久性的核武器国家(除非实现最终消除核武器的承诺),其他作为非核国家的成员,将再难有机会从事有关核武器的活动了。不扩散话语所含的否定性关系在90年代中期定型。此种关系的形成过程充满着对非核国家的核武器政策与活动的否定,排斥,拒绝,任何一个非核国家对核武器一旦有丝毫欲望,现存的核国家不会说别的,只会说不允许。

2. 发话者队伍的扩展加快合法化进程 在英国科学家参与美国研制原子弹的时候,英国政府领导人就决定必须自己制造它,认为这与其帝国的威望和地位才相称。战后英国的考虑也是如此。1952年和1957年其分别成功地试爆了原子弹和氢弹。对前苏联而言,原子弹这种超级武器的吸引力太大了。斯大林认为原子弹是“非常危险的武器,所以决不允许任何国家单独拥有它;但原子弹的危险程度还没有达到不允许任何国家拥有它的地步”。^③这种思考导致美国对核技术进行控制企图的失败,也导致了1949年苏联核试爆的成功。戴高乐的信念是“法国不拥有核武器是从来不能接受的,”“法国必须拥有核武器以便将它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1960年法国试爆原子弹成功时,戴高乐发出的公开电报是:“法国万岁!从今晨开始,它变得更加强大而自豪。”^④法国原子弹是它参加大国俱乐部的入场券。中国决定研制核武器也毫不例外的是着眼于国家安全、民族自尊、实力和国际的地位。毛泽东曾说,“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的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⑤1964年中国也成为核国家。

最初美国独家拥有原子弹时,它不支持英国发展,严禁向苏联透露任何秘密,反对法国研制核武器。到1959年,不扩展话语的发话者也就是美苏英3国,受话者主要是法国、中国和其他有发展核武器意向的国家。发话者渴望独自享有核权力,害怕此项权力的扩散。当5个公开拥有核武器的大国聚集在不扩散条约、全面核禁试条约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出口委员会的旗帜下时,意味着核国家都成了不扩散话语的发话者。这种情况正好使不扩散话语获得了合法性的地位。发话者队伍扩展的过程就是不扩散话语的合法化过程。

当核不扩散的发话者仅为一个时,该话语要求得到合法性地位异常困难,它所借助的工具几乎微乎其微。当另外一个或几个发话者加入此行列时,不扩散话语取得合法性地位所借用的途径就多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建立是不扩散机制的制度性工具。它作为重要的国际性组织,其规章必须为成员国遵守。核不扩散条约和部分/全面核禁试条约,有其法理上

的基础,签署国越多,就越具有合法性。所有这些组成了不扩散话语的法律基础,形成一种法律关系,这样,非核国家的核活动被置于两元对立的体系之中:合法之外便是不合法,允许之外便是禁止。

3. 检查机制的确立 非核国家一旦认可或接受不扩散话语,那它们就被纳入一种权力和服从性的关系网和该话语的笼罩中,而且在舆论的竞技场上,它们也被置于客体的位置,接受主体(发话者)的审视,检查它们的行为是否合乎不扩散话语所确立的规范。发话者还为自己制定了行动的指针——检查非核国家(受话者),方式有现场核查,监视和平用途的核电站,置放仪器从技术上监视核爆炸活动。这样,不扩散话语从组织和机构方面在实现自己的功能目标,又通过组织与机构的活动不断重复这些目标,再经过舆论工具的多次渲染和反复,到下一次有关的机构和组织在实现话语的目标时,效果就尤其明显。

最初的核不扩散话语是体现在禁令的语气之中,发话者与受话者“相约”禁止扩散核武器技术和允诺不输入核武器、不制造核武器。不过一旦“约定”,受话者的核武器意图就成为被否定的对象,成为法规制裁的对象,成为检查机制行使功能的对象。除了说同意之外,只能沉默。受话者的核武器活动不能进行,也不能存在,否则,种种压制性的东西就紧逼而来:经济制裁,武器禁运,两用技术进出口的限制,军事上将遭受打击,在形象上被塑造成不负责任的国家、因而不是文明社会中的一员,等等。所以,核武器的扩散成为一种禁忌,类似一种恐惧(对发话者和受话者都如此)。总之,受话者的核武器活动被置于一种无前途的地位,除了在心理上和行动上都缴械投降之外,简直无处可逃。这种状态在20世纪90年代表现得尤其明显。1998年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核竞赛也表明,尽管一个主权国家在意志上有权利决定自己应该做什么和可以做什么,但在核武器欲望上总是受到制度化的不扩散话语所制约。随后这两个国家声明它们将加入《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这也说明了它们拥有的选择并不多。

4. 作为职业和知识的对象 核武器出现以后,首先是给政治决策提供了一个主题。该不该使用它,怎样使用,对谁使用,是否独家拥有,谁可以拥有,谁不该或绝对禁止拥有,其他国家有了它之后怎么办等诸问题都是决策圈内的问题。由此产生一批人以此为业,以谋士的身份思考,创造了一整套政治-学术术语,营造了种种相关的核话语,不扩散话语是其中之一。核战略家、核军控专家的出现表明核战略及不扩散意向给人提供了职业上的机会。

核不扩散话语成为职业的对象意义在于它有助于此种话语取得合法性地位。要使之有前途,就必须使其对象有存在的合理基础,使它有生命力,尽量使它成为人们敬畏的职业。不扩散话语被研究,被人们谈论,供媒体报导。既然作为职业对象就已经存在,就必须让其永存。它逐渐成为职业对象的过程就是取得合法性地位的过程。

职业化过程也是它成为知识对象的过程。在90年代,学术界对核不扩散话语进行了充分的论证,试图说明能成立的理由。在这一方面,理论界的努力成了使之合法的帮助者。这种努力是建立在种种如下的学理假说之上。假说一:允许核扩散意味越来越多的国家拥有制造核武器的能力,最终的局面就是众多的核国家之间的无政府状态,使爆发核战争的可能性极大。核不扩散可以使局面简明,易于稳定危机。核扩散则使局势走向反面。所以,核扩散是不能接受的。假说二:极权国家,或不负责任的“邪恶国家”拥有了核武器会轻易地使用,从而爆发核战争。甚至有明确而具体的国家被列入这种行列。这种假说还被置于“民主和平论”的更具有哲学性和政治学特点的理论基础之上。假说三:缺乏理智,或具有独裁倾

向的领导人,以及偏执狂掌握了核武器的使用权,他们轻易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较大。某些国家领导人和恐怖主义分子被列入同一个范畴。这种假说还得到了生物学、心理学、精神分析学和行为学等科学的支持。假说四:核扩散不利于地区的安全和危机稳定。这是一个更具有军事学术性的假说,它认为核扩散将产生许多核门槛国家,它们粗陋的核武器非常容易被敌对一方的廉价常规武器所摧毁,这种情况会诱使这类国家首先使用核武器,以不至于浪费它。

这些假说遭致了也有说服力的反对。例如,独个核国家更有可能使用核武器,因为它不怕遭致报复,这已经为历史所证明。将有些国家视为不负责、无赖国家,是歧视性的。最关键的是,人们是通过怎样的渠道知道这些国家的形象的?或者,这类国家的形象是怎样形成的?反对的理由可以说是媒体和英语的魔力,因为,人们不得不通过英语来了解世界所发生的事。但是,这些反对的声音不为重视,甚至很少有人知道,因为很难使反对性的话语通过非英语渠道为人知道。也许更重要的是,你本身没有核武器,国力微不足道,身价低微,所以连说话的资格都没有。

目前,核不扩散话语的势力正如日中天,说它会消失是臆测。只存在一种情况才能使核不扩散话语消失:核武器本身消失。有一种在道义上非常有吸引力的主张,即干净、彻底地销毁核武器;核武器的存在本身就是不道德的。销毁核武器作为终极性目标,要历经相当长的时间才能看到曙光。

核武器不存在了,但核不扩散话语会以另外的形式延续下来。这就是禁忌。这是人类记忆中的禁忌。在核武器刚刚销毁后,或许人类会松一口气,核恐惧在人类的大脑中会淡化。但时间一长,它会被唤醒,渐渐地会清晰地出现在人类的记忆中。更主要的是,它是一种制度化的话语,有实施其功能的机制;有人研究它,有媒体关注它,有惩罚机制,有核查机构。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使曾经存在过的、恶魔般的核武器不存在。

类似于核不扩散话语的功能在其他武器上也出现了,似乎有传染性。这就是生物化学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禁止与销毁。相类似的是,这也是美国等大国的创意。人们在媒体上了解到这类武器的危害性太大了,应该销毁它。海湾战争后,销毁伊拉克的这类武器成了头等大事。更进一步说,冷战结束后,大国的权力就在于表现它们有能力决定哪些是其他国家不能拥有和禁止使用的力量。核武器、生物武器、化学武器对人类来说确实意味着灾难。它们的兴衰都说明,制造它们是为了增强国家的权力,现在销毁它们,也是为了表现其发言者的权力。这个过程可以说是一个讽刺:制造它们就是为了要销毁它们。

(作者单位:上海对外贸易学院 广州社会科学院)

注释:

① 米歇尔·福科,《性史》,张廷深等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第90、92页。

②③④⑤ 麦克乔治·邦迪,《美国核战略》,褚广友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第239、254、639、706页。